

林庚诗文集

第三卷

中国文学史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撰写的准备工作始于1934年,1937年作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1941年,厦门大学出版油印本《中国文学史》前三编《启蒙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书中作者首倡“唐诗中的少年精神”。1946年该书第四编《黑夜时代》撰成。1947年5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朱自清先生为之作序。今据厦门大学1947年5月初版及作者校正的手迹排印。原书系繁体直排,今改为简体横排。

第三卷目录

中国文学史

朱佩弦先生序	3
自序	6

启蒙时代

第一章 蒙昧的传说	10
第二章 史诗时期	19
第三章 女性的歌唱	29
第四章 散文的发达	38
第五章 知道悲哀以后	49
第六章 理性的人生	70
第七章 文坛的夏季	78
第八章 苦闷的醒觉	88

黄金时代

第九章 不平衡的节奏	98
第十章 人物的追求	111
第十一章 原野的认识	129
第十二章 旅人之思的北来	

	144
第十三章 主潮的形式	153
第十四章 诗国高潮	162
第十五章 古典的先河	182
第十六章 修士的重现	190
第十七章 文艺派别	200
第十八章 散文的再起	216

白银时代

第十九章 口语的接近	226
第 廿 章 凝静的刻画	235
第廿一章 抒情时期	245
第廿二章 晚唐余风	257
第廿三章 骈俪的再起	267
第廿四章 古典的衰歇	277
第廿五章 文艺清谈	286
第廿六章 第四乐府	293
第廿七章 理性的玄学	304

黑夜时代

第廿八章 梦想的开始	316
第廿九章 讲唱的流行	328
第 卅 章 杂剧与院本	337
第卅一章 舞台重心	347
第卅二章 章回故事的出现	356
第卅三章 梦的结束	

	364
第卅四章 女性的演出	372
第卅五章 诗文的回溯	382
第卅六章 文艺曙光	390

中国文学史

朱佩弦先生序

中国文学史的编著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研究实在还在童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许多学科,就说史学罢,也只在近三十年来才有了新的发展,别的社会科学更只算刚起头儿。这样我们对于文学史就不能存着奢望。不过这廿多年来的文学史,的确有了显著的进步。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这二十多年来,从胡适之先生的著作开始。我们有了几部有独见的《中国文学史》。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上卷,着眼在白话正宗的“活文学”上。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着眼在“时代与民众”以及外来的文学的影响上。这是一方面的进展。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着眼在各时代的主潮和主潮所接受的文学以外的种种影响。这是又一方面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相辅相成,将来是要合而为一的。

林静希先生(庚)这部《中国文学史》,也着眼在主潮的起伏上。他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而老,然而文学不止一生,中国文学是可以再生的,他所以用《文艺曙光》这一章结束了全书。他在《关于写中国文学史》一篇短文里

说他的“书写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计划着,若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连续下去。”这部新文学史该是从童年的再来开始。因此著者常常指明或暗示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的衰老和腐化,教我们警觉,去“摸索光明”。照那篇文里说的,他计划写这部文学史,远在十二年以前,那时他想着“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是“时代的特征”,也就是主潮。这与他的生机观都反映着“五四”那时代。他说“热心于社会改造的人们,以为伟大的文艺就是有助于理想社会的文艺,但爱好文艺的人们,却正以为那理想的社会,必然的须是接近于文艺的社会”。他“相信,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因此“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文艺的社会”。明白了著者的这种态度,才能了解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

著者有“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他说“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所以这部书写的时候,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这确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在当前这时代更其如此;著者见到了这一层,值得钦佩。书中提出的普遍问题,最重要的似乎是规律与自由,模仿与创造——是前两种趋势的消长和后两种趋势的消长。著者有一封来信,申说他书中的意见。他认为“形式化”或“公式化”也就是“正统化”,这是衰老和腐化的现象。因此他反对模仿,模仿传统固然不好,模仿外国也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里他说:“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我们不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模仿了。”信里说,他要求解放,但是只靠外来的刺激引起的解放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得自己觉醒,用极大的努力“唤起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而“创造之最高标帜是文学”。

著者认为《诗经》代表写实的“生活的艺术”,所歌咏的是一种“家的感觉”,后来变为儒家思想,却形成了一种束缚或规律。楚

辞时代“相反的浪漫的创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种异乡情调和惊异”，也就是“一种解放的象征”。这两种势力在历代文坛上是此消彼长的。这里推翻了传统的诗骚一贯论，否认骚出于诗。骚和诗的确是各自独立的，这是中国诗的两大源头。但是得在《诗经》后加上乐府，乐府和《诗经》在精神上其实是相承的。书中特别强调屈原的悲哀，个人的悲哀；著者认为这种悲哀的觉醒是划时代的。这种悲哀，古人很重视，班固称为“贤人失志”，确是划时代的。是从屈原起，才开始了我们的自觉的诗的时代。著者在那信里认为中国是“诗的国度”，故事是不发展的，“楚辞的少年精神直贯唐诗”，可是少年终于变成中年，文坛从此就衰歇了。唐代确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分水岭，特别是安史之乱。从此民间文学捎带着南朝以来深入民间的印度影响，抬起了头，一步步深入士大夫的文学里。替代衰歇了的诗的时代的是散文时代，戏剧和小说的时代，故事受了外来的影响在长足的进展着。著者是诗人，所以不免一方面特别看重文学，一方面更特别看重诗；但是他的书是一贯的。

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这点点滴滴大足以启发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他们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解答些老问题，找到些新事实，找到些失掉的连环。著者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虽然也叙述史实，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这在一般读者就也津津有味，不至于觉得干燥，琐碎，不能终篇了。这在普及中国文学史上是会见出功效来的，我相信。

朱自清 三十六年五月于北平清华大学

自序

我计划写一部文学史,大约在十二年以前,那时我开始担任中国文学史这门功课。当时的感觉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觉得大学里中文系的课程,历史偏重于旧的,而中文系学生们的期望,却往往是新的,但实际上,就新文学已有的历史与材料上来说,的确又没有多少课程可开;这事实上的缺陷,催促着我发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这原来正是文学史应有的任务,所以这部书写的时候,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书写到“五四”以前,也正是计划着,若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新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连续下去。

另一方面的感觉,是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自然一个主潮是不会凭空而来的。欧洲文学自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以至于稍后的新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都莫非在寻觅这主潮的努力中;而至今还是各是其是,似乎仍没有一个大家可以公认的结果。非特文学如此,即在艺术的其他部门,如近世绘画上派别的奇特纷纭,音乐上之走向歌剧与利用不谐和的半音的尝试,凡此种种,也都还在寻觅这主潮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这将来的主潮如何,自然要参照过去主潮的消长兴亡。我们应当与世界上寻觅主潮的人士,共同投身于探寻的行列中,我们不应当在人家还正在未可知的摸索着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模仿了。我们对于自己这一份寻觅的工作,不觉得太懒惰了吗?

我又常想,我们如果要获得一个大的答案,必须先要解决无数较

小的答案 ;否则便不免流于主观 ,武断 ,与不完全。我因此开始注意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没有解决过的问题。例如中国何以没有史诗 ?中国的戏剧何以晚出 ?中国历来何以缺少悲剧 ?《诗经》之后二百年文学上何以竟无诗篇产生 ?《天问》与《九歌》同为楚辞 ,何以前者与《诗经》反更为相似 ?词的长短句如果像历来所认为的 ,是解放的形式 ,则何以词的范围反较诗更狭小 ?李白有诗的复古韩愈有文的复古 ,何以后者成功而前者无结果 ?本同于《诗经》的四言诗在魏晋间何以又竟能复活 ?……这些乃都必须有一个一贯的解释 ,而要解释这一大串问题 ,又绝非一条线索所可以说明。把许多条线索接成一根巨绳 ,这便是文学史上主潮的起伏 ;他虽在显示旧的 ,却正可以预言新的。我因此对于每一章 ,都用一个主题来写 ,借此使问题的核心得以更为清楚明白。我以为时代的特征 ,应该是那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盛唐之世 ,与北宋时期 ,同为太平盛世 ,在生活上可谓相差无几 ,然而唐人解放的情操 ,崇高的呼唤 ,与人生旅程的憧憬 ,在宋代都不可复见 ;这正是唐宋文艺的分野。我们如果希望一个伟大文艺时代的来临 ,便必须从那错误的思想形式与错误的人生情绪中醒觉。我在这里似乎又牵扯到许多文化上的问题 ,尤以谈思想的篇幅似乎占去太多 ,这是不得不首先声明的。

所谓伟大的文艺正如伟大的时代 ,人们常常有其不同的解释 ;热心于社会改造的人们 ,以为伟大的文艺就是有助于理想社会的文艺 ,但爱好文艺的人们 ,却正以为那理想的社会 ,必然的须是接近于文艺的社会。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社会的理想也就是什么 ,西汉是一个史称承平富产的时代 ,甚至于我们至今还以汉人自豪 ,可是汉代就产生不出文艺的果实 ;所以汉代的社会也就最没有意义 ,最没有理想。我很想说明这一点人生的憧憬 ,至少我在写文学史时 ,更使我相信 ,那能产生优秀文艺的时代 ,才是真正伟大的。没有文艺的时代 ,无论如何 ,离开那理想的社会必然还远 ;所以我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之要求某一种文艺 ,我则只要求那能产生伟大的文艺的社会。

文艺是领导人生的 ,但它并不就是幸福 ,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

他的保证吗？我们愈是想保证幸福，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正如同我们如果紧抱住和平，战争不久就会走来一样。人类的文明，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进步。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证人生，于是在儒家的手里人生就愈弄愈糟。愈想保证的，最后便必须放弃，因为那放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创造必须具备的条件。伟大的文艺时代，常产生在我们失去保证的时候；东周失去了西周从容的凭藉，于是有了大量国风的歌唱与楚辞；建安以来失去了汉代平静的生活，于是有了从五七言诗到宋词这一段时期，这历史的事实，将显示给我们人类文明的又一阶段，那也便是社会要向文艺学习的时候。

我写这部文学史，只有这一点初衷，我以为在黑暗里摸索着光明的，正是文艺；有文艺就有光，就有活力，然后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文学史正如其他的历史，虽然它不会再来，却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警觉。

这部书的前三编，民国卅年曾由厦大出版组，以油印本装订成书，当时是用来发给班上的学生，并分赠与友人的。去年厦大复员后，计划出版“大学丛书”，并愿先印这一部文学史，因把第四编一并写出。书成，又承朱佩弦先生厚意写序，尤其使我十二分的感谢。此外汪伯明校长与厦大出版委员会诸位先生对于这部书的好意，以及王云波先生在事务方面许多的帮忙，使得于印刷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形下，终能让这部书与世人见面，都在此敬表谢忱。

三十六年五月在厦门

第一章 蒙昧的传说

●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本来面目 ●舜禹的神话都在南方 ●后羿与夏后启的传说 ●宇宙的故事 ●仅存的神话目录 ●西王母与夸父等 ●不可信的逸诗

中国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这古老的事迹,常给我们以光明的感觉,然而所谓商周两大民族,虽然居于北方,在它们之前,却似乎已有很多民族替他们开辟了疆域。这些民族,究竟什么时候冒险到中国中部,而变为土著,已无可考,但他们的文明必已在这新来的民族之前发达。中国古代传说上最重要的一回战事,是黄帝与蚩尤之战,《史记》上记载这件传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当时的地位,非常之高;《龙鱼河图》说:“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黄帝之战胜蚩尤,正如希腊人之战胜波斯,其中有多命运的暗助,所以《龙鱼河图》又说:“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山海经》也记载这类似的神话,《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海水北入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

工之台 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而《大荒东经》又说:“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邱,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应龙的故事,《山海经》里数见,《大荒北经》说:“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所以应龙原是在北方的,因为征服夸父蚩尤,才得到南方去。所谓夸父,他曾与日竞走,大约就是《史记》上所谓的炎帝,都是南方的象征。所以《大荒南经》有记载蚩尤的事:“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史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南至于江,登熊、湘。”《古今注》:“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都说明黄帝的大敌乃在南方。这南方的民族,在当时《管子》说他“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姜氏也。”他的文化所以较早且高于黄帝,《国语》:“少典生炎帝黄帝,成而异德。”贾谊《新书》:“炎帝者,黄帝异父同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这一支北方的民族,后来居上;《大荒北经》记载黄帝的传说最多,又说那里有轩辕之国,而《西山经》则说:“轩辕之丘,无草木,洧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黄帝征服蚩尤之后,他的地位日渐增高,《山海经》记轩辕之台说:“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可见他当时的神威。他南面而行,渐渐的学得了当时土著的文化,而雄霸中原,所以文化自南而北,民族自北而南,这一个历史上的交流,也便是中国文明最初的起源。

在这一个起源上究竟有多少神话流行着,现在已无可考,不过《生民》上姜嫄的故事,仍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则在此之前,当必有更多失传的神话。《山海经》是一部比较可信的书。大约成于战国末期,因为距离神话流行的时期较远,而所谓《山海图》

者又必不能十分详尽,其中自然不免有后人想像的成分,但从那叙事的平实简略,与矛盾的记载之多,都表现着古代传说的真实性。这传说久远的特有现象,一方面使我们觉得可信,一方面却零星不全,我们要想找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了。

除了《山海经》的神话之外,保留一些古代传说的则有《楚辞》。《楚辞》里说到尧的时候非常少,即使说到也不过作为一个普通的帝王看,但舜的地位则非常高。《离骚》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又说:“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何以不陈词于尧而单单对于舜这样敬为神明呢?屈原临终时作《怀沙》,仍然念念不忘于“重华不可违兮孰知余之从容”。湘君湘夫人前人也解为是与舜有关的,《史记》又说他“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海内经》:“南方苍梧之邱,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会稽旧记》以为:“舜,上吴人,去吴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又说:“舜,东夷之人,生姚丘。”这些记载,自然都不甚可靠,但舜的传说,何以与南方有这么多的关系?《五帝本纪》里尧是黄帝的直接系统,而舜的先人都是庶人,这明明表示舜是起于另一个支源的,黄帝、尧、舜正如蚩尤,只是一个部落的代表而已。所以尧与黄帝的传说,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若大胆认为他就是黄帝,也无不可。《山海经》里黄帝轩辕的事迹很多,却没有尧单独的记载,《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都已失去了神话的趣味,当是较晚的记载。《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木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猥滌、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猥滌,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汉人的传说,当然更不可靠,但

后羿射日之事,见于《天问》,十日的传说,见于《山海经》,我们乃可以想到“上射十日”正相似于杀“炎帝”、“夸父”的传说,断修蛇于洞庭,正是蚩尤的根据地,证之“赤蛇”、“育蛇”的传说,似乎更有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妨假定黄帝与尧是北方民族的代表。这些传说里,是否也有周人的成分,大约十分错杂,正如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许多是相像的一样。至于舜与禹,却是南方部落的代表,他们的传说所以与后来的楚辞关系最大。

楚辞里除了《天问》治水的一段外,虽然很少提到禹,但屡次提到夏,“就重华而陈词”之下所问的就是夏启的事,而“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舜与夏的关系,实在非常密切。《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吕氏春秋·音初篇》又说:“禹治水至于南土,有涂山氏之女,令其妾待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候人兮猗。’”所以《天问》里也说:“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涂山在会稽,而《国语》又说:“禹会诸侯于会稽。”《史记》说他“东巡狩至会稽而崩”。禹的传说,都在会稽,这岂非正是舜的出处?所以我们如果把舜与禹都看作南方部落的化身,正无不可。这民族在南方一直强大,虽然周室衰败,楚子问鼎,但终于为北方的民族所征服。《山海经》上记载舜的传说如《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曰名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记载禹的传说如《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这“依姓食黍使四鸟”,又与另外一条《大荒东经》:“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国姓,黍食,使四鸟”的记载如出一辙。又《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郭璞《山海经注》引真本《竹书记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